

---

---

#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

陈友骏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转型期三大阶段。TPP 折射出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的新思考。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 TPP 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依然希望借助 TPP 主导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并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日本理念融入新体系的构建进程。受其影响,未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相关规则及制度设计会更多反映日本因素的存在,这也将加剧中美日三方围绕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主导权竞争。

**关键词:** 日本对外经济战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TPP 价值链分工 中美日经济关系

**作者简介:**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7)02-0082-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安倍经济学的‘TPP’战略研究”(编号:2015BGJ003)。

凭借安倍政府的斡旋与推动,日本国会众议院于2016年11月10日批准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关法案,日本率先成为走完 TPP 国内审批程序的国家。但两个月之后,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即签署行政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 TPP。

日美两国对 TPP 的态度天壤之别,凸显日本在 TPP 问题上的政治考量,更折射出日本希望取得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主导权的战略意图。本文拟深入研究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过程与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日本因素对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秩序的动态影响。

## 一、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演变

关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表述,基本没有在日本政府公布的官

方文件中直接出现过，但查阅相关文献不难发现日本围绕这一重要战略精心构思和谋划的蛛丝马迹。

细读二战后日本政府公布的第一本《通商白皮书》(1949年)，即可深切感受到日本对经济合作的向往，以及希望借此实现自身经济独立与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及亚太局势的深刻演变，日本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关注点逐渐聚焦于亚太地区。

作为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一个侧面表述，日本政府公布的2015年版《通商白皮书》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扩大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合作是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长必须依托亚太地区的总体发展和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的支撑，因此日本将着力推进 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亚太经贸新合作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经济合作之网”。<sup>①</sup>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政策演讲中也高调指出，日本同时处于两个层面的重要位置：一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太与印太两个逐渐崛起的重要地区；二是处于国际政治范畴内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其中的制度主要指管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劳动及环境的规则。<sup>②</sup>2016年版《日本振兴战略》中又明确提出，日本要在构建诸如 TPP、RCEP、中日韩 FTA 等新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核心功能，力争成为构建均衡、包容、高水准的世界规则的主要引擎。<sup>③</sup>

综合上述官方表述，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可见一斑，即为了确保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分阶段、分步骤地在亚太域内构建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机制，以不断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水平与质量，并为完善全球经济合作体系奠定重要基础。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存在显著的演变过程，主要受制于国内经济及整体国力的影响，同时美国因素在不同阶段所释放出的不同政治效果，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影响并制约着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①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2015』、2015年、289頁。

② 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2013年2月22日、CSISでの政策スピーチ)、2013年2月23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2015-10-01]。

③ 日本経済再生本部『日本再興戦略 2016』、2016年、47頁、[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2016\\_zentaihombun.pdf](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2016_zentaihombun.pdf) [2017-02-10]。

(一)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发展的三阶段

总体来看,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参见表 1)。

表 1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发展与演变

时 间	具体政策及建议
1967 年	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五国企业家共同创建“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
1968 年	日本学界组建“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日本提出“跨太平洋”的战略构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
1980 年	日本与澳大利亚共同创建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日本提出应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
1989 年 11 月	APEC 正式成立, 日本成为创始成员方。
1993 年 11 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 APEC 西雅图会议上提出, 要在亚太地区建立制度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 对此, 日本强调 APEC 应坚持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 避免成为实体性组织, 实则与美国观点相悖。
1995 年 11 月	日本举办 APEC 大阪会议, 创造了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亚太方式”, 并宣布提供 100 亿日元作为“前进中的伙伴关系基金”。
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日本前财务省高级官员榊原英资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遭美国强硬反对。
2002 年 1 月	日本同新加坡签署首个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2002 年 10 月	日本外务省正式公布日本的 FTA 战略。
2006 年 8 月	日本提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构想。
2007 年 11 月	第三次东亚峰会期间, 与会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的建议, 嗣后该中心成立, 日本成为主要参与方与运营方。
2009 年 9 月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政策设想。
2012 年 8 月	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部长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2012 年 11 月	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 宣布启动中日韩 FTA 谈判。
2013 年 3 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日本正式加入 TPP 谈判。
2016 年 2 月	日本、美国等 12 个国家正式签署 TPP。
2016 年 11 月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 TPP 相关法案。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各种资料整理制表。

### 1.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实则从 1952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国结束对日本的政治统治算起，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万象凋敝，国民经济基础遭受严重破坏，落后的经济条件制约了日本对外战略的视角与眼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的“单独占领”使日本失去了外交的权利和自由，并使日本的对外战略全盘变为对美战略。迫于内外部客观环境的限制，战后初期的日本并未在重构亚太经济秩序，尤其是重构亚太贸易投资秩序的相关问题上发表过重要的政策阐述，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完全放弃了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追求。

经过 2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日本对外战略的视野亦扩张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逐步成形，并为之后的具体落实做好了必要准备。这一时期，日本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显现出独特的“探路”模式，主要目的是观察美国对其政治及外交的态度。与此同时，囿于美国对其经济政策及对外政策的现实束缚，日本将战略实施的重心放在民间交流上，商界和学界成为这一战略的实际承担者和牵线人，日本政府则隐藏在二线担当“遥控”的重要角色。作为标志性的政治动作，1967 年，日本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五国的企业家共同创建了“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1968 年，日本学界又倡议组建了“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尽管上述两个国际性组织中并没有日本政府的身影，但背后却难以脱离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问题上的克制与谨慎态度。

### 2.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成长期

这一阶段基本覆盖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

1968 年日本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对外贸易及投资的战略视角逐步转向海外，加上日美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后者甚至严重影响日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引发日本政府的极度担忧。以此为背景，日本国内产业开启了大规模的向外转移，并寻求在第三方的生产制造及对美出口，以规避美国对日本产品的各种限制。受其影响，日本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亦由“萌芽期”的沉思与规划转为积极寻求战略突破，希冀构建以“开放

的地区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亚太经贸合作新模式。<sup>①</sup>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的视域已将亚太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焦点区域，并将其作为实现日本政治大国抱负的战略平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学界提出了“跨太平洋”的战略构想。紧随其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抛出了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政治倡议。转瞬间，日本政府走到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台。应该说，大平首相的这一表态充分展现了日本对亚太贸易投资及经济一体化发展前景的战略规划，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对统合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真实想法。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急速升值，这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但也带来了经济泡沫的膨胀，此后泡沫经济崩溃重创日本经济并使其陷入长期低迷。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急速抬头，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一批主流政治家逐渐占据舆论先导，积极主张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加速实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具体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日本积极主张并推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与扩大，欢迎、鼓励域外国家或地区参与APEC的相关活动等。诚如日本学者星野三喜夫所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就已在精心谋划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总体框架，并率先提出“跨太平洋”的战略构想，之后又积极主导并创设APEC平台等。这些行动与经验，赋予日本在亚太贸易投资等相关议题上特殊的“自负感”。<sup>②</sup>

而且，这一阶段的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是“双轨式”的，即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经济的广域性合作，落实自己构想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制度层面的框架设计等。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标志着世界贸易治理体系成功转型，一个更为全面且更具约束性的全球贸易合作机制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日本持欢迎态度，并希望全球贸易及投资的合作势头可以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建设与发展。

### 3.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转型期

这一阶段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提出建立“亚

<sup>①</sup> 参见池元吉、李晓《探索和调整中的日本亚太经济战略》，《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1期，第70页。

<sup>②</sup> 星野三喜夫「TPP参加は日本の優先順位の1つである」、『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紀要』第40号別刷、2012年7月、37頁。

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遭美国强硬反对，并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一想法。嗣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进入了转型阶段，由积极推动亚太整体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及经济一体化，转为重点推进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域内的小范围贸易投资合作，但日本并不打算放弃亚太经济合作的长期目标。

21 世纪初“小泉构想”的出现表明，日本开始寻求一条务实的区域经济合作道路。<sup>①</sup> 与此相对应，日本迅速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置于 FTA 或者说“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sup>②</sup> 2002 年 1 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首个 EPA。之后，日本政府正式对外公布 EPA 战略，并提出要将日本 EPA 所涉及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70% 以上。在此背景下，日本又陆续签署了日本—墨西哥 EPA（2005 年 4 月生效）、日本—马来西亚 EPA（2006 年 7 月生效）、日本—智利 EPA（2007 年 9 月生效）、日本—泰国 EPA（2007 年 11 月生效）、日本—印度尼西亚 EPA（2008 年 7 月生效）、日本—文莱 EPA（2008 年 7 月生效）、日本—东盟 EPA（自 2008 年 12 月起依次生效）、日本—菲律宾 EPA（2008 年 12 月生效）、日本—瑞士 EPA（2009 年 9 月生效）、日本—越南 EPA（2009 年 10 月生效）、日本—印度 EPA（2011 年 8 月生效）、日本—秘鲁 EPA（2012 年 3 月生效）、日本—澳大利亚 EPA（2015 年 1 月生效）、日本—蒙古 EPA（2016 年 6 月生效）等多个双边经济合作协定<sup>③</sup>，使日本设想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基本覆盖了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也为在多边层面落实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奠定了扎实基础。

当然，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转型的动因并不能完全归于美国的强硬反对，还与全球贸易投资合作进入“难以推进、持续徘徊”的动荡阶段有关。WTO 多哈回合谈判遭遇多重困境，导致日本对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制的发展前景心存疑虑。<sup>④</sup> 鉴于此，日本才选择了一条较为务实的“渐进主义”推进路线。

---

① “小泉构想”的基本思路是，以日本—新加坡经济合作模式为模板，强化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进一步联合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亚太域内国家，建立范围相对较小的“东亚共同体”。参见倪月菊《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 FTA 还是 TPP》，《当代亚太》2013 年第 1 期，第 82 页。

② 日本的 EPA 战略不仅立足于与货物及服务贸易相关的 FTA 等，更涉及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商业环境治理、人员流动、经济合作等广泛内容，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参与 TPP 只是日本对外贸易投资战略的延伸与实践，是新形势下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必然选择。

③ 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index.html> [2016-11-14]。

④ 参见倪月菊《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 FTA 还是 TPP》，《当代亚太》2013 年第 1 期，第 81 页。

由是观之,无论是“小泉构想”的东亚共同体,抑或此后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设计的“东亚共同体”,还是日本提出并积极实施的 EPA 战略,其核心思想均为利用有限的时间,在相对较小的空间范围内,促进高效的贸易投资合作,实现自身构想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有效突破,并为亚太地区未来的整合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因此,进入转型阶段的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显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安倍政府急于推动 TPP 的政治哲学。即,日本自身所构思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与展现,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及国内政治保守化趋势日趋加重的现实条件,安倍政府只能重新选择跟随美国,并借助 TPP 平台,暂且在短时间内实现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有效突破。但事实上 TPP 前途未卜,这又会拉长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转型的时间,致使其不得不在短期内做出新的政策调整与应对策略。

## (二) TPP 折射日本对构建亚太经济合作秩序的新构想

日本在 TPP 问题上的具体政策,真实反映了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构想与演进。具体而言,TPP 签署之后,日本国内对 TPP、中日韩 FTA 及 RCEP 的战略态度发生了明显位移。原先主张同时推进 TPP、RCEP、中日韩 FTA 三个经济合作协定,即“同步推进原则”<sup>①</sup>的声音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优先发展 TPP,并采取“择优原则”,选择性地推动 RCEP 或中日韩 FTA 的签署及生效,进而谋划构建整个亚太地区贸易投资新体系。但事与愿违,特朗普新总统上台后即宣布美国正式退出 TPP,这不仅打乱了日本意图参与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治理体系的计划安排,更一举将亚太时刻表拖入了“后 TPP 时代”。面对如此窘境,安倍政府似乎并不愿意就此将 TPP 束之高阁,但因着实遭遇重大挫折,所以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显现出一定的战略转型。

第一,日本希望与其他相关国家构建“没有美国参加”的 TPP,并就此发挥充分的主导权。

实际上,日本在 TPP 谈判进程中支付了巨大的经济成本,而且 TPP 是“安倍经济学”对外经济合作计划的“招牌”项目。因此,出于政治与经济的各种考量,安倍政府不舍得、更不情愿抛弃犹如“囊中之物”的 TPP。鉴

<sup>①</sup> 在安倍政府的第一届产业竞争力会议上,包括住友商事、东丽、小松等日本大企业的代表不约而同地主张同步推进的原则。参见贺平《从 CEPEA 到 RCEP: 日本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转向》,《日本学刊》2013 年第 2 期,第 78 页。

于此，TPP 仍是日本政府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潜台词，而首相安倍晋三也伺机利用不同场合，竭力宣扬 TPP 的竞争优势与潜在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TPP 成员国也明确表示不放弃 TPP 的坚决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驰援了安倍政府的政策意图和战略决心，更为 TPP 的落地生效残留了“一线生机”。

另一方面，美国的退出使日本成为 TPP 现行机制中的最大经济体，也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对于志在实现“政治大国”抱负的安倍政府而言，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一方面，TPP 本来是美国主导下的政治产物，而安倍政府的全盘继承至少可以让特朗普政府放心，也可以使这一政策举动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国的缺席有助于安倍政府躲避前者的束缚，使其能在 TPP 议题上“肆无忌惮”地发挥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塑造日本的亚太政治经济大国地位。

第二，日本意图构建“高质量”和“高标准”的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

进入 21 世纪，日本较为热衷于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如日本—东盟自贸协定、日本—澳大利亚 EPA 等，但相关协定的涉及内容并不如 TPP 定义得如此广泛和复杂。此外，日本在亚太域内与 TPP 基本同步推进的还有 RCEP 和中日韩 FTA。中日韩 FTA 主要因为政治原因，谈判进程受到一定阻碍；而且，日本在知识产权、投资准入等问题上始终坚持过高要价，致使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至于 RCEP，其多数参与方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低门槛的介入”是其最为合理、也是最为便捷的发展方式，但这显然与以“高门槛”自居的 TPP 格格不入，而日本在 RCEP 问题上的态度反复出现摇摆，并最终将其锁定在“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过高定位上，致使 RCEP 的谈判也几乎陷入绝境。

在刚结束的第 17 轮 RCEP 谈判中，日本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TPP 国家组建“TPP 朋友圈”，主张以 TPP 为样板推进 RCEP 谈判，在投资与贸易问题上达成高标准规则。显然，这与参与 RCEP 谈判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完全背离。由此，RCEP 谈判各方围绕着关税、服务贸易等关键议题的意见分歧进一步拉大，妥协的可能性逐步缩小，致使此轮谈判又未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一基本态度源自国内的强大压力。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发布的政策报告指出，日中韩 FTA 及 RCEP 的相关协定应瞄准 TPP 的水平，努力打造成高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合作协



定。<sup>①</sup> 经团联的政策建议还具体地指明了中日韩 FTA 及 RCEP 应该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努力方向,这实则对日本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对外交涉构成一定的牵制,甚至约束了其谈判的空间及回旋余地。

总之,日本业已明确了未来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方向,即类似于 TPP 这样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协定是日本设定的基本目标<sup>②</sup>。不仅如此,日本希望在与欧盟进行谈判的 EPA 及其他经济合作协定中推广“适合 21 世纪”的经济规则,并发挥重要的领导力。<sup>③</sup>

第三,亚太经贸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实现路径必须是日美主导。

尽管日本曾在 TPP、RCEP 和中日韩 FTA 三者中优先选择了 TPP,但就构建亚太贸易投资新体系、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进程而言,日本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路线图。换言之,日本在路径选择上具有多元性,并不拘泥于单一路径与标准。这里必须提一下亚太自贸区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 Pacific, FTAAP)。2014 年中国在 APEC 峰会上再度强调建设 FTAAP 的长远目标,亚太主要经济体均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日本也在其中。而且,诚如日本学者中岛朋义所言,中长期来看,随着 TPP 和其他广域 FTAs 的深化,最终会形成涵盖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的、最适合亚太地区发展的 FTAAP。<sup>④</sup> 由此可见,日本也认为 FTAAP 符合日本贸易投资发展的长期需要,能为日本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 FTAAP 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尽管如此,安倍政府并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这一重要的亚太政治经济进程,与之相比,更乐见“美主日从”,抑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二者共同主导的局面发生。在第 17 轮 RCEP 谈判中,在遭遇 TPP 重大挫折和美国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安倍政府选择了“以拖为进”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借助一次失败的 RCEP 谈判,尽可能消除“美国退出 TPP”所产生的政治阴影,提振

①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日中韓 FTA ならびに東アジア地域包括的経済連携 (RCEP) 交渉に関する要望」、<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6/036.html> [2016-09-16]。

② 2016 年 8 月末,笔者负责的课题组赴日本经济产业省、外务省等政府机构,就 TPP 等相关议题进行调研,受访对象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将中日韩 FTA、RCEP 等均打造为与 TPP 相类似的“高质量、高水平”(high-quality, high-level)的经济合作协定。

③ 首相官邸「CLSA ジャパンフォーラム 2016 安倍総理講演」、[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225kouen.html](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225kouen.html) [2016-09-15]。

④ Tomoyoshi Nakajima “The TPP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rom the Japan - China - RO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de*, Vol. 10, No. 3, December 2012, p. 76.

TPP 相关国家的战略信心；另一方面，争取一定的过渡时间，为即将启动的日美经贸合作框架谈判创造条件，同时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搅乱中国旨在主导 RCEP 谈判的战略部署。

综上所述，尽管安倍政府已开启“后 TPP 时代”的多项政策准备，但囿于主导权的政治博弈，使其难以在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战略进程中坦然自若。

## 二、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特征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扩容，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及投资重心也由传统的耐用消费品逐步转移至生产性设备及零部件等。但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日趋饱和的国内需求，迫使日本制造业必须“走出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这就进一步提升了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识与实践步伐。在此背景下，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逐步浮出水面，形成具体的思路及想法，部分甚至已转变为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措施。

从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中不难发现，其背后潜藏着日本式的逻辑特征。总体而言，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表现出不同层面的“固化”与“变化”特征。

### （一）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固化”特征

第一，坚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长期目标不动摇。

从日本战后最初参与创建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到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经济圈”，再到之后建议并合作建立 APEC，提出不同版本的“东亚共同体”及积极参与 TPP，日本的对外战略始终牢牢紧盯亚太地区不放。尽管如前所述，进入 21 世纪，日本推进经济合作的重心已转至双边为主的 EPA 战略，并把经济合作的主要对象定位为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但这仅是日本迫于整体推进的现实困难以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多重制约所采取的务实性政策，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整合亚太经济的战略追求。对此，可借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句话：日本追求 TPP 的真实目的也是为了与亚太国家创建诸如 FTAAP 等更大的经济合作

圈，TPP 仅是这一重大计划的起步。<sup>①</sup>

日本之所以始终坚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长期目标不变，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1）海洋国家的战略定位，促使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偏重于靠近太平洋的一侧而非面对大陆的一侧，同时更在潜意识中刺激了其依托海洋航线、将自身与亚太国家及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范式；（2）“脱亚入欧”传统思想的作祟，导致日本依旧将对美关系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而这又间接地将日本与亚太地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3）亚太地区突出的资源优势与战略纵深正好弥补了日本国家发展所遭遇的制约性“瓶颈”，因此，日本希冀依托贸易与投资的双向渠道，牢牢锁定亚太地区的丰富资源及发展潜能。

第二，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路径更为明确。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型”，之后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两种经济论述实则成为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理论基础。诚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从实践经验来看，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走的是梯度搬迁的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以食品、纺织品等初级产品为主；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制造业的海外投资转变为以重化工业为主；进入 80 年代之后又进一步转向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等行业。在日本渐次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转移制造业的过程中，形成了‘雁行分工体系’。该分工体系以日本为核心、以垂直产业间梯度分工为特征，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的渐次起飞。”<sup>②</sup>

不仅如此，为了更为高效、便利地推进以其为核心的所谓“雁行分工体系”的构建，日本努力通过签署并实施贸易及投资合作协定，降低或消除贸易及投资对象国的准入门槛，完善对方的营商环境，为日本产品或日本企业的进入创造条件。而且，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每况愈下，结构性改革等诸多经济政策均宣告无效。在此背景下，日本意识到国内经济若要走出困境，急需借助更多的外部力量，并通过缔结 EPA 等经济合作协定，扩大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以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sup>③</sup> 尽管如此，日本高技术产业

① 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1006kaiken.html](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1006kaiken.html) [2015 - 11 - 20]。

② 苏杭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15 年第 3 期，第 19—20 页。

③ 参见宫占奎、曾霞 《亚太地区 FTA 整合问题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 59 页。

及重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等均保留在日本国内，并不向外转移，而其所强调的外部力量主要集中在合作对象国的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及市场资源上，产能合作的重心也巧妙地规避了技术合作的关键议题。这样一来，日本对外经济合作尽管可以通过有限的贸易和投资实现量的突破，但难以达成质的突破，不过这有效地维护了日本在这一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至于 TPP，其知识产权保护功能一直是日本所强调并推崇的。日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从另一侧面直观地反映出其对海外投资尤其是技术投资的保护力度，因为高新技术是保证日本制造始终雄踞垂直分工体系上游的关键，也是支撑并维护以日本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基础。鉴于此，日本宁愿牺牲包括农业在内的国内部分产业的经济利益，以换取以 TPP 框架为基础的新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第三，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制定亚太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的争夺。

战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日本一直给人以“一流经济、二流政治”的深刻印象，但在亚太范畴，日本却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并没有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与计划，反而颇有主张地推动其所设计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于如何推进亚太经济统合这一富有战略性的问题，战后的日本可谓充满了想法与魄力，以前首相大平正芳为首的政治家们更是努力实践这些思想的重要人物。大平正芳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之后，日本就积极投身于亚太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倡导及推动了 APEC 的产生。不仅如此，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制度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之后，日本竟然一反常态地表示反对，凸显了“日本可以说‘不’”的独立欲。进入 21 世纪，日本国内又不断涌现出“小泉构想”“EPA 战略”“东亚共同体”“TPP 战略”等新想法与新观念，虽然说法不一，但其核心都是日本必须主导、抑或合作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隶属于首相官邸的重要咨询及建言机构——“回首 20 世纪、构想 21 世纪世界秩序和日本角色的有识之士恳谈会”就曾提出，日本应在实现 TPP 及未来的 FTAAP 中发挥主导力，以维护并提升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TPP 完成谈判工作转入国内审批程序后，日本似乎超越美国成了 TPP 的实际主导者。2016 年 11 月 10 日，日本国会众议院表决批准

<sup>①</sup> 20 世紀を振り返り 21 世紀の世界秩序と日本の役割を構想するための有識者懇談会『20 世紀を振り返り 21 世紀の世界秩序と日本の役割を構想するための有識者懇談会報告書』、2015 年 8 月 6 日、37 頁。

了 TPP 相关法案。<sup>①</sup>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却公然表态搁置 TPP 的国内审议进度，留待下届政府决断；而特朗普新政府一启动，随即正式宣布退出 TPP。从日美两国围绕 TPP 问题截然不同的表态与做法来看，显然日本并不愿意放弃 TPP 以及有可能以 TPP 规则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而且，美国缺乏后续动力和引领力或许给了日本一个难能可贵的机遇。总之，日美两国在 TPP 问题上的博弈，充分表明了日本意图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战略意图。

## （二）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变化”特征

随着外界因素的改变，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逻辑思维也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第一，中短期的着力点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坚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长期目标始终未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及方式却发生了多次改变，这决定了其中短期目标的因应而变。也就是说，日本从战略视角出发，把合作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作为定向目标，但在战略落实的过程中，却以合作构建次区域经济圈作为主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sup>②</sup> 这完全符合日本传统的政治哲学，实现了战略与战术的统一、长期与短期的统一。

总体来看，日本构建亚太经济合作体系的中短期目标主要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进而引发了其亚太经济圈政策重心的转移，并凸显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政策重心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即由完整的、均衡的亚太经济圈缩小至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再转移至以 TPP 为基础而形成的 TPP 经济圈；（2）政策属性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变为半开放的合作模式，并最终演变为封闭的或排他性的合作范式。换言之，日本选择加入 TPP，充分表明其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范式亦由开放

<sup>①</sup> 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TPP 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安倍政府上台之后，随即抛出“安倍经济学”，被视为安倍政府治理国内经济、实现经济复苏的标志性工程。但是，尽管“安倍经济学”的内容不断扩充，央行的货币发行量日益扩大，相关的政策目标也逐步提升，日本经济却没有显现出复苏迹象，始终徘徊于负增长或者说衰退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安倍经济学”遭遇日本舆论的质疑，安倍政府也因此备受谴责。为了实现“安倍经济学”质的突破，安倍政府急需一场表面上的“胜利”来证明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政绩。为此，安倍政府将 TPP 视为最大的赌注，而国会审批就成为一场有趣的赌局。

<sup>②</sup> 参见金明善、王厚双《日本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太平洋学报》1997 年第 2 期，第 90—96 页。

松散型逐步转变为排他竞争型。

第二，以日本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发生实质性变化。

一国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的格局，实际是由其国内经济及产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对于外向型经济体而言，后者又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能力建设。由是观之，战后日本经济实现逐步复苏及高速增长的过程，实则也是其渐进地扩大对外贸易及投资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了它在不同阶段构建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业已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有限的市场需求及贫瘠的矿产资源等制约了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因此，日本将开拓海外市场及确保海外资源的供应作为其主要的新经济战略。日本积极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而“福田主义”的提出可视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进军东南亚，不单纯是为了追求低廉的工资和用地成本、逃避治理污染的费用以及低价获取生产原料等，更是日本“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sup>①</sup>这里所谓的国际战略，就是日本希冀依托东南亚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类产品等，附加日本优良的制造业产能和高新技术，构建一套以日本为核心的、封闭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至此，日本所设计的“雁行模型”也初步构建完毕。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发展与改善，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也步入正轨。以此为背景，日本也逐渐扩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并把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战略重心放在了中国大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企业的海外战略或日本经济整体的海外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不断在亚太范围内寻找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低限制标准的生产加工地，以降低产品的最终生产成本，而这一切均以日本本土的绝对性技术优势为重要支柱。简言之，这一战略的内核是日本的优良技术，基本构成却是依托海外的生产线与消费市场。毫无疑问，在过去较长的时间段内，中国一直是日本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依赖，中国高质量的劳动力以及与其完全不对称的低报酬成本，有效地弥补了日本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所造成的竞争劣势，同时也为日本核心技术的升级与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类生产成本的普遍上升，依托“粗放型生产”“低成本竞争”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日渐式微。对

<sup>①</sup> 市村真一編著『日本企業インアジア』、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10—11頁。

此，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也有所担忧，部分日本企业甚至因此关闭了在华的工厂或生产基地，并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日本所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也发生同步性位移，即由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生产基地、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经济圈，转移至以新贸易投资标准为依托而形成的 TPP 经济圈。尽管后者还没有展现完整的形态，但发展趋势却已清晰可见。

第三，影响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因素的影响因子在逐步衰落。

应该说，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基本受制于美国因素，或者说，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是前者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亚太局势的整体变化及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位移，美国因素的决定性功能日渐式微，而中国因素对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影响作用却在持续增强。

就日本选择 TPP 及调整亚太经济合作战略而言，其实质动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1) 中国崛起及中日换位。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转入“新常态”，继续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而与此相对，“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将日本经济带出衰退边缘。中日经济迥然不同的发展境遇，使两国经济总量日趋悬殊（2015 年中国 GDP 已超过 10 万亿美元，而受日元汇率贬值等因素影响，日本 GDP 跌落至 5 万亿美元以下）。此外，中国提出并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中国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积极响应。对于中国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产生了心态上的恐慌与焦躁，更流露出自卑与失望的情绪。甚至有观点认为，中长期来看，中国最终将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中日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亦将日益增强，因此，如何为中国“量体裁衣”般地设定好规则，是日本以及周边国家的头等大事。<sup>①</sup> 从这一层面来看，TPP 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于亚太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追求与期待，更是平衡中国实力和影响

<sup>①</sup> 星野三喜夫「TPP 参加は日本の優先順位の1つである」、『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紀要』第 40 号別刷、2012 年 7 月、57 頁。

力增长的潜在工具。

(2)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本对美外交重回“一边倒”态势。尽管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且“倒向美国”成为其对外战略一贯的代名词，但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议题上却存在不同声音，有时甚至会违背美国的意志，提出“鹤立鸡群”的政策主张与战略构想。比如说，1993年11月的APEC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制度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对此日本表示明确反对，认为APEC应坚持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避免成为实体性组织，这也符合日本当时所坚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经济合作指导原则。<sup>①</sup>又如鸠山政府曾提出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引发美国的警觉和反感。尽管如此，日本“出格”的政策主张或战略构想还是少之又少，既不敢显现出与美国的公开对峙，也不敢挑战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议题上所独占的主导权。最终，各种“反美”或“独立”的愿望，均在美国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变得弱不禁风，很多政治主张只能“胎死腹中”。

由是观之，TPP同样折射出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政策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的强大影响力，当然也从另一侧面凸显中国因素的显著存在。不可否认，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产物，其主要动因是美国为了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同时稳固美国在制定亚太及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问题上的主导权。同样，日本也是基于与美国相同抑或相似的认识，才“毅然决然”地参与并推动TPP谈判进程，最终促成TPP的达成。综上所述，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凸显了其现实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充满强烈的时代特征。

### 三、日本因素对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的影响

作为世界第三大及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日本对战后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日本的战略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更希望能借助这种对外影响力的输出，实现自身“政治大国”的抱负。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构建，是其

---

<sup>①</sup> 参见金明善、王厚双《日本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第94页。



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站在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战略视角，日本因素的融入突出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规模性调整，将直接引发亚太贸易投资流的方向性变动，进而影响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动态结构。

日本企业掌握着较高的科技研发能力和较强的生产能力，并且在海外积极设点布局，以获取投资目的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和丰厚的土地资源等。而且，习惯于“抱团取暖”的日本企业组建了相对封闭的生产系统，系统的核心是知名的大企业或大财团，而中小企业作为重要的零部件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一生产系统之中，组成各种连贯的产业链。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迅猛发展，由日本企业组建的不同产业链主要分布于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东亚地区，进而辐射整个亚太及全球市场。但是，随着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转变以及上述生产系统的结构性调整，未来日本企业的布局重心会逐渐向整个亚太地区移动，尤其是向参与TPP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移动，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及供应链发生结构性变化。受其影响，日本对外贸易及投资的资金流向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带动亚太域内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流及资金流发生同步性变化，并促使整个亚太域内的贸易投资结构因应而变。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因素对亚太贸易投资新体系的影响不容小觑，而抓住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战略设想是预判未来亚太贸易投资新体系结构的重要突破点。

第二，在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结构框架层面，日本因素的作用将集中体现在规则及制度设计上，尤其是日本技术标准的向外输出导致整个亚太区域产品标准及技术规范的上升，进而带动知识产权等与技术发展紧密关联的立法立规工作的同步提升。

实际上，日本已将发展未来产业竞争力的主要着力点转移至“技术标准”这一核心范畴，并积极与欧美等技术研发强国进行战略性合作。2016年10月初，迫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的强大市场竞争压力，日本纠集美国等45个国家发表共同宣言，要求制定武装无人机出口及使用的国际标准。<sup>①</sup>不仅如此，日本更借助自身较高的食品生产加工工艺，制定日本式的国际化“食品安全管理规格”，意图借此扩大日本对外食品出口，同时限制其他竞争对手的

<sup>①</sup> 参见《日美等45国发表宣言呼吁制定武装无人机出口标准》，共同社华盛顿2016年10月5日电。

产量及销量。<sup>①</sup>由此可见，日本已通过不同方式启动并介入产品标准及技术规范的国际竞争，并对全球相关产业及产品的标准化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部分甚至已转化为事实存在的客观标准及技术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TPP 的相关规定超越了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等传统贸易优惠措施，转而重点强调准入标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公平竞争等制度层面的规则竞争，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科技能力和技术竞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约有 65% 的日本企业认为有必要加入 TPP。<sup>②</sup>也就是说，加入 TPP 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日本希望借助自身超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垄断亚太乃至全球相关制造业的战略意图。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产业发展的丰厚基础及产业结构的现实条件，会抬高日本对亚太贸易投资新规的要求及期望，进而转化为日本谈判要价的筹码。而且，一俟日美两国在技术标准领域建立同盟，则会滋生出阻碍公平贸易、公平竞争的高新技术壁垒，进而扰乱整个亚太贸易投资新体系的构建进程。更为严重的是，日本“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容易抬高贸易投资新规的门槛，并可能成为新规“谈而不定、拖而不决”的隐患。

第三，在宏观层面来看，日本因素的介入容易加剧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主导力竞争。

就当前局势来看，中美两个大国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规的主导力量。尽管二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就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规则的意愿而言，中美两国的战略是一致的，也是可以合作的。当然，就主导权而言，美国显然并不愿意与其他任何一个域内国家或地区分享独有的主导权，致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规始终难以成形。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发现，日本显然也希望成为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规的主导力量，借此凸显其在亚太地区政治及经济问题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2016 年 5 月，日本借七国集团（G7）伊势志摩峰会之机，大肆推进并鼓吹 TPP 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中的影响力。为了进一步加速 TPP 的达成与生效，G7 伊势志摩峰会首脑宣言中竟然写明，“TPP 构建了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共有基础，更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为了推动 TPP 尽早生效，G7 将鼓励 TPP

① 参见《日本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食品安全规格以扩大出口》，共同社 2016 年 7 月 27 日电。

② 株式会社帝国データバンク「TPP に関する企業の意識調査」、2011 年 1 月 11 日、1 頁。

成员国，以使其尽快完成与 TPP 相关的国内审批手续。<sup>①</sup> 由此，日本伺机推动 TPP 及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成形的战略意图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围绕着引领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一事，原本中美之间的双边竞争就演变为中美日之间的三边竞争，不仅加剧了竞争的难度，更容易引发外交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之间就建有盟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绑架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展开。鉴于此，日本加入引领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规的竞争之后，或许会造成“中国对日美”即“1 对 2”的非均衡状态，致使中国完全陷入相对被动的境地，难以形成与日美对等的议价能力和外交资源。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日本倒向中国的情况发生，即出现“中日对美国”的“2 对 1”局面。尽管就目前局势而言，这一可能性相对较小，但鉴于中日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同时中日两国在宏观经济治理的理念上存在一定共性，因此中日共同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新规的共建并非天方夜谭。但无论怎样，日本的介入会加剧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可能引发更为激烈的竞争，这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都是不希望见到却又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改革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有目共睹，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世贸组织等不同平台充分显现。诚如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所指出的，当前全球存在 3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投资协定，“碎片化”现象极为明显。为此，“G20 中国年首次将跨境投资议题纳入 G20 合作范畴，中方倡议制定 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各成员制定国内政策和商签对外投资协定提供指引”。<sup>②</sup>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日趋增长，中国推动亚太及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改革的能力和动力亦将逐步上升，而在此之中，日本因素的长期存在或许是中国必须加以思考并谨慎应对的重要环节。

<sup>①</sup> 「G7 伊勢志摩首腦宣言」、2016 年 5 月 27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60267.pdf>[2016-09-01]。

<sup>②</sup> 参见高虎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5 日。

## A Study on Japan's Economic Partnership Strategy in Asia – Pacific Region

*Chen Youjun*

The formation of Japan's economic partnership strategy in Asia – 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 – war period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stages, which include the period of germination,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Japan's way of promoting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shows some new thinking of Japan's economic partnership strategy in Asia – Pacific region. The new U. S. president Trump insists on U. S. withdrawal from TPP. However, with the aim of ensuring the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Japan still intends to take advantage of TPP, and integrates its concept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standards” with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ew system. Given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will b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system in Asia – Pacific region, and the new system design will inevitably reflect more of Japan's presence. More importantly, it will also intensify the competition among Japan, U. S. and China, all of which are eager to take the leading role in building the new system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 日本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戦略の研究

陳 友駿

戦後、日本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戦略は萌芽期・成長期・転換期という三つの段階を経てきた。TPPはこのテーマに関わる日本の新たな考えを反映している。アメリカのトランプ新大統領の就任がTPPに致命的な打撃を与え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は依然としてTPPを頼みとして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の新システムの構築を主導し、「高品質」と「高水準」という日本の理念を新システム構築のプロセスに取り入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影響を受け、未来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経済協力システムには大きな構造的変化が生じ、ルールや制度の上で日本的な要素がより多く反映さ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そのため、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協力に関する新システム構築の主導権をめぐり、中日米三カ国の競争は更に激化するだろう。

(责任编辑: 叶琳)